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主 编 凌 宇

编著者（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攸欣 吴 敏 李树槐

罗成琰 周国良 凌 宇

徐 麟 谭桂林 颜 雄

南海出版公司

2005·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史/凌宇主编.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1

ISBN 7-5442-2763-4

I. 中... II. 凌... III. 现代文学—文学史—中国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5882 号

ZHONGGUO XIANDAI WENXUESHI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主 编 凌 宇

责任编辑 张 辉

特约编辑 聂 敏

装帧设计 水木时代(北京)图书中心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6568511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城大厦五层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安徽省蚌埠市广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9.25

字 数 517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2763-4

定 价 39.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	-----

上 编

1917~1927 年的文学

第一章 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7)
------------------	-----

第一节 历史渊源与外来影响	(7)
第二节 改良八事与革命三义	(11)
第三节 观念更新与话语转型	(15)
第四节 社团流派与文学期刊	(18)
第五节 思想论争与文学批评	(22)

第二章 诗体的解放与探索	(27)
--------------	------

第一节 概 述	(27)
第二节 初期白话诗	(31)
第三节 郭沫若	(35)
第四节 湖畔诗人和小诗运动	(41)
第五节 闻一多	(45)
第六节 徐志摩	(48)
第七节 李金发	(52)

第三章 鲁迅——现代小说的奠基者	(56)
------------------	------

第一节 生平与创作道路	(56)
第二节 《呐喊》与《彷徨》	(60)
第三节 《阿 Q 正传》	(75)
第四节 《故事新编》	(80)

第四章 “问题小说”与“乡土小说”	(85)
-------------------	------

第一节 概 述	(85)
第二节 冰心 庐隐	(90)
第三节 王统照 许地山	(94)
第四节 叶圣陶	(96)
第五节 王鲁彦 彭家煌 废名	(100)

第五章 自我抒情小说 ·····	(104)
第一节 概 述·····	(104)
第二节 郁达夫·····	(106)
第三节 创造社其他作家·····	(109)
第四节 浅草社作家·····	(112)
第六章 个性独异的散文 ·····	(114)
第一节 概 述·····	(114)
第二节 鲁迅散文(上)·····	(117)
第三节 周作人·····	(128)
第四节 冰心 朱自清·····	(131)
第五节 梁遇春 许地山·····	(138)
第七章 现代戏剧的兴起 ·····	(143)
第一节 概 述·····	(143)
第二节 话剧体式的诸种尝试·····	(146)
中 编	
1927~1937 年的文学	
第八章 新文学运动的政治分化与多元互补 ·····	(157)
第一节 普罗文学运动与左翼作家联盟·····	(157)
第二节 新月社与自由主义文艺思潮·····	(161)
第三节 “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的文艺思想·····	(165)
第四节 文艺思想上的其他论争·····	(168)
第五节 发展中的文学批评·····	(173)
第九章 左翼小说 ·····	(177)
第一节 概 述·····	(177)
第二节 蒋光慈 柔石·····	(187)
第三节 茅 盾·····	(192)
第四节 丁玲 张天翼 艾芜·····	(200)
第五节 叶紫 吴组缃·····	(209)
第六节 东北作家群·····	(214)
第十章 “京派”与“海派”小说 ·····	(220)
第一节 概 述·····	(220)
第二节 老 舍·····	(224)
第三节 沈从文·····	(230)
第四节 萧乾 芦焚·····	(237)

第五节 穆时英 施蛰存·····	(241)
第十一章 其他作家的小说 ·····	(246)
第一节 巴 金·····	(246)
第二节 李劫人·····	(255)
第十二章 体裁多样的散文 ·····	(259)
第一节 概 述·····	(259)
第二节 鲁迅散文(下)·····	(263)
第三节 何其芳 丽尼 李广田 陆蠡 ·····	(282)
第四节 林语堂 丰子恺·····	(288)
第五节 报告文学·····	(292)
第十三章 现代戏剧的丰收 ·····	(295)
第一节 概 述·····	(295)
第二节 曹 禺·····	(298)
第三节 田汉 洪深 夏衍 李健吾·····	(310)
第十四章 新诗的分流与多元格局 ·····	(319)
第一节 概 述·····	(319)
第二节 臧克家·····	(323)
第三节 戴望舒·····	(326)
第四节 汉园诗人·····	(329)
下 编	
1937~1949 年的文学	
第十五章 新文学运动的区域分流与历史选择 ·····	(339)
第一节 抗战初期的文学运动·····	(339)
第二节 国统区的文学运动·····	(342)
第三节 上海孤岛与沦陷区的文学活动·····	(345)
第四节 解放区的文学运动·····	(348)
第五节 时代激流中的文学批评·····	(351)
第十六章 新诗的嬗变与整合 ·····	(355)
第一节 概 述·····	(355)
第二节 艾 青·····	(359)
第三节 田间与“七月”诗人·····	(366)
第四节 穆旦和《中国新诗》诗人群·····	(372)
第五节 民歌体诗·····	(378)

第十七章 国统区小说	(383)
第一节 概 述.....	(383)
第二节 沙汀 钱钟书.....	(390)
第三节 路 翎.....	(396)
第四节 张爱玲 徐讦 无名氏.....	(401)
第十八章 解放区小说	(409)
第一节 概 述.....	(409)
第二节 赵树理.....	(416)
第三节 孙 犁.....	(423)
第四节 “土改”小说.....	(426)
第十九章 现代戏剧的多元竞妍	(434)
第一节 概 述.....	(434)
第二节 历史剧.....	(437)
第三节 讽刺喜剧.....	(441)
第四节 新歌剧.....	(443)
第二十章 渐次衰歇的散文	(448)
第一节 概 述.....	(448)
第二节 梁实秋与沈从文的散文.....	(452)
第三节 报告文学.....	(456)
后 记	(461)

绪 论

半个世纪以来,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有史以来四种性质互异的形态概念,已被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中国现代文学也因此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这一地位,已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一方面,是近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越界”现象,暴露出原有疆域分割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脆弱性;另一方面,一些新的文学史观念的出现,例如“20 世纪中国文学史”^①,便是其中已经产生广泛影响的一种——更是从根本上动摇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科独立性。

原有的划分及对这种划分的质疑与挑战,自然源于不同的史学标准。古、近、现、当的划分法,基于对各自赖以产生的中国社会及其主要阶级矛盾性质的认定——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阶级矛盾的性质决定着文学的性质。由此而来的对中国现代文学性质的界定——“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②,既区别于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古代文学,又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近代文学,其独立的品格便被突显出来了。然而,如此一来,文学史完全成为政治史、革命史的附庸,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与内在的规律性被消解,而由此进入文学史叙述的操作过程,对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评价取舍,就难免以偏概全、轻重失衡、贬抑失当。

如果从文学的价值形态与艺术形态着眼,中国现代文学与 20 世纪其他时期的文学明显的保有内在的质的同一性。因此,“20 世纪文学史”这一概念,也许更具有作为一门学科所需要的独立品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既非具有独立的价值形态的文学史概念,也不是一种具有严格的独立意义的艺术形态概念,它只是一个有关文学的时间概念或文学发展的阶段概念,即所谓中国现代文学,是发端于 1917 年《新青年》杂志倡导文学革命,迄于 1949 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文学。

认定中国现代文学只是一个阶段的文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自主性固然被消解;但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却在更广阔的文学

^① 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二十世纪文学三人谈·缘起》,《读书》1985 年第 10 期。

^②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 6 月版,第 8 页。

界域内,获得了更为丰富的价值内涵和文学意义。从20世纪初叶到《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前这一时期的文学,只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这部戏剧的序幕,而中国现代文学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上卷,是它的奠基期。从文学的价值形态到话语形态,完成了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根本性的转变,而由此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主题取向及基本的主题群落,则决定着20世纪文学的总体走向。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是从20世纪初叶开启的。而真正完成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的历史转变——从话语模式到价值观念的全面转型,则是中国现代文学。

首先,其表现为文学总体价值取向的嬗变。这一嬗变,肇始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对民族生存危机的反思。而这一反思,又经历了从物质文化层面,到政治制度层面,再到思想文化层面的艰难探索过程。正如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所说,由最初“器物上感觉不足”到“制度上感觉不足”,再到“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正是这种“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最终导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性的批判。在否定性层面上,它是对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全面解构,而在肯定性层面上,则是对民族文化品格重构的呼唤。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发生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感应着民族文化变革的这一历史要求,中国现代文学从其发生伊始,其总体的价值取向就集中重建怎样的民族文化品格与如何重构上,这不仅表现为一种理论倡导,而且体现在文学创作实践中。从鲁迅早期关于“立人”的思想,到五四时期李大钊之再造“青春之我”,胡适对“新人格”的诉求,周作人的人道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的立人主张,到40年代初沈从文“经典的重造”,直至延安时期提出的塑造“无产阶级新人”的创作主张,对新的民族文化品格的呼唤,贯串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始终,并一直延伸到当代。

然而,上述种种有关民族文化品格的诉求,从其预设赖以成立的文化资源上看,由于西方人本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三种主要文化形态的参与,却呈现出复杂的多元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重构史,就是这三种主要文化形态争夺重构主导权的历史。它们彼此间的联盟与对立,演绎出一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三国演义”。而由此衍生的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群落——父子冲突、灵肉冲突、国民劣根性批判、传统美德的发掘、传统美德与因袭重负的两难选择、个性主义与集体主义冲突、家国冲突、宗教人伦与世俗人伦的冲突、阶级性与人性的冲突、原始生命力的张扬等等,其内涵的不同文化冲突所构成的叙述张力、由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和

探索精神体现出来的文化焦虑及隐伏于作品背后的作家心路历程,铸就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品格,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富魅力和真正的价值所在。

重构民族文化品格的总体指向,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两个鲜明特征:其一,对普通人的平凡人生的强烈关怀。对民族文化品格重构的思考,始终侧重于国民灵魂的改造上。对知识分子和城乡劳动群众的人生命运的抒写,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题材领域。中国现代文学的这种平民精神,开创了20世纪中国最宝贵的文学传统。其二,现实主义精神烛照下的创作方法的多样性。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本无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创作方法之分。这种民族文学的集体无意识,也阻碍着中国现代作家信奉某种单一的创作方法。虽然,在20年代,有过李金发的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移植,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也分别倡导过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30年代,新感觉派也曾风光一时,但无论就文学的整体形态,还是就每位作家的创作形态而言,却呈现出一种“杂糅”——创作方法的多样性特征。然而,无论是以某种创作方法为主也罢,还是“杂糅”诸种创作方法于一体也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却一律表现出对现实人生、对20世纪中国问题的强烈关注。现实主义精神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始终。

其次,中国现代文学对古代文学的转型,同时表现为话语模式的嬗变。“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新道德代替旧道德”被视为新文学运动的两面旗帜。它分别从形式与内容两个层面,简明地描述了中国文学这一历史嬗变。可是在这里,文言——白话之变,仅仅被看做是语言形式之变。然而,从深处看,发生在五四时期的文言——白话之变,绝不仅仅是语言形式之变,而是一种话语模式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从胡适倡导白话文,到白话文获得正宗地位这一转变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作为一种话语模式,决定着文学的基本叙述形态,关涉到谁说、对谁说、说什么诸层面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型,开启了中国文学从个人话语(说自己想说的话,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言说主体与言说对象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到启蒙话语(启蒙者的言说,启蒙者的角色认定决定了言者与受者的启蒙——被启蒙的关系),再到大众话语(言说者成为大众的“代言人”,原先在启蒙话语中的启蒙者变成受教育者,被启蒙者成为教育者)的历史行程。于是,原先似乎游离于具体的文学创作形态的有关白话——文言之争、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等文学现象,其内涵的深刻意义便浮现出来了——贯串于现代文学话语模式演变背后的思想文化冲突,与民族文化品格重构这一现代文学价值层面的诉求谐振。而且,文学话语模式的演变并不到现代为止。在当代,文学话语模式似乎又呈现出从大众话语到启蒙话语,再到个人话语的回流趋势。从20世纪初到90

年代,文学话语模式演变过程所显示的这种回环形态或螺旋式形态,是20世纪中国耐人寻味的文学语言现象。

诚然,作为文学的话语模式,除了谁说、对谁说、说什么之外,还有一个如何说的问題。正是在这一点上,见出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性的成就与缺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即使仅仅在如何说的层面上,也诞生了一批杰出的优秀作家,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其中,有些还堪称白话文学的写作典范。这些作家与作品,不仅在当时产生过极大影响,而且极大地影响着当代文学的面貌。然而,在整体的艺术成就上,中国现代文学还难以同世界文学比肩,同中国古代文学的成熟相比,也还显得幼稚。就诗歌而言,从初期的白话诗到40年代的“九叶诗派”,其体式虽迭经变迁,却始终没有脱出尝试期;在小说方面,叙述模式尚嫌简陋,长篇创作尤显薄弱,没有诞生出史诗式的经典之作;话剧创作又带有过重的模仿、移植痕迹,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话剧精品尚不多见;散文虽然在五四时期便呈现早熟迹象,却是更多地得益于中国古代散文的遗传。而到三四十年代,报告文学、杂文的兴盛几乎淹没了抒情散文的进一步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毕竟只是白话文创作的初始阶段。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在某种程度上白话文表现为语言形式的一种突变。而短短的30年,既不能与拥有数千年写作历史的古代文学同日而语,也无法同语言形式的变迁是一个渐进过程的西方现代文学相比。另一方面,又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情况相关。在近、现代,中华民族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历史处境,以及由此孕育的民族忧患意识与作家们意识到的历史使命感,使得在文学观念方面,过多地强调了文学的启蒙、教育功能,而容许与默认了重思想、轻技巧,将文学创作等同于一般宣传品倾向的抬头,也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现代文学在叙述方法上取得更大的进展。

然而,无论如何,中国现代文学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工程奠定了基础。它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它所留下的成就与问题,都将对中国文学的现实与未来产生深刻影响。深入地研究、总结中国现代文学30年的经验与教训,以铸造中国文学的新的辉煌,则是文学后来者的历史使命。

上 编

1917~1927 年的文学

第一章 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第一节 历史渊源与外来影响

1917年1月,由北京大学文科教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发表了留美学生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文章针对中国旧文学的种种弊端,提出了改良文学的八项主张,表达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要求改良文学以使其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共同愿望。次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予以呼应,首先“高举文学革命军大旗”。胡适、陈独秀之后,又有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相继撰文参与“文学革命”的讨论。1917年底,应陈独秀之邀,胡适提前回国并到北京大学任教。1918年春,《新青年》编辑部扩大,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胡适等人先后参加了编辑工作。于是,一场以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主要内容的文学革命运动,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至此,中国文学的演变与发展也以此为标志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这次文学革命的进行并不是孤立的,它的兴起与发展同20世纪初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息息相关。自从鸦片战争打碎了清王朝老大帝国的沉沉昏梦之后,软弱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与现实情势使得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一直在苦苦寻索富国强民的道路。首先有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继之有戊戌变法,效法西方搞君主立宪;然后有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府。但是,这些努力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共和实际上成了一块空头招牌。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清醒地意识到,封建君主专制赖以长存的精神文化基础远未被革命铲除,广大国民尚处于愚昧麻木之中,对社会革命的认识十分淡漠。“吾国年来政象唯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①于是,继科技引进、体制革命之后,思想启蒙被寻找救国道路的知识分子们推向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最前沿。他们认为,思想

^①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1916年1月《新青年》第1卷第5号。

启蒙可以同时解决辛亥革命暴露出来的两大问题,既能够通过对儒家文化传统的批判铲除封建君主政体的精神基础,又能够通过引进西方文化中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观念唤醒国民,启发国民,促进国民意识的现代化,进而实现国民人格的改造与重铸。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创刊,标志着20世纪初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该刊一开始就以思想革命为己任:一方面集中而猛烈地攻击封建专制主义及其精神支柱孔孟儒家学说;另一方面大力介绍西方自由民主学说与科学进化思想。由于思想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把国民从封建伦理道德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因而作为封建伦理道德最有效也最常用的载体,中国封建时代的旧文学就不得不在新文化运动的反对之列;同时,由于思想启蒙的主要对象是处于蒙昧状态的下层民众,为了让新的思想观念能以最通俗的形式为缺少教育的下层民众所接受,与日常口语严重脱离的文言文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对象。正是在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这一中心任务方面,1917年开始的这场文学革命既是对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必然要求的顺应,也是这场新文化运动曾经最早取得的成就的一个组成部分。

恩格斯曾经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内发生的种种新变革、新学说,“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却又往往以“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①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开端的这场文学革命运动也是这样,它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由维新派人士发起的文学改良运动。19世纪末维新派领袖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是集学术文章于一身的政治家,他们在从事政体革命的同时,也敏锐地感觉到了文学作为思想的重要载体,对于传播自己的改良主张有着重要的意义。于是,他们在戊戌变法前后几年里,曾经提出过许多文学改良的主张,其中包括“新文体”、“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及“白话文运动”等。

“新文体”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是梁启超,他在戊戌变法后流亡海外,先后在香港等地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他自己也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在政治思想上宣扬君主立宪主张,在文体形式上则有意识地进行改良实验,目的在于把文章从八股文、桐城古文和骈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创立一种新文体。梁启超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新文体”作过如下自述:“启超夙不喜桐城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以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页。

对于读者颇有一种魔力焉。”由此可见梁启超“新文体”在当时的影响程度。这种“新文体”其实是一种改革了的文言文,虽然尚未脱尽文言的窠臼,但它显然为中国文学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型起到了桥梁的过渡作用。“小说界革命”的主要倡导者也是梁启超,他在1902年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面猛烈攻击旧小说“诲淫诲盗”,一面大声疾呼把小说与社会改良结合起来,他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格,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梁启超把小说推崇为“文学之最上乘”并极其重视小说的宣传启蒙作用,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无疑是开风气之先而又惊世骇俗的。它以疾风迅雷之势,打破了歧视小说的封建文学观念,开创了一个欲藉小说以改良社会、开通民智的文学时代,对中国新文学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影响。

“诗界革命”的主张首先是由黄遵宪提出来的,黄遵宪是清末大臣,曾出使东洋,对西方文明有直接的了解,他曾支持政治维新运动,在文学方面也力主变革。在《人境庐诗草》中,他抨击了封建文人尊古贱今的谬误观念,挖苦了旧文学中沾习剽窃的不良风气,更可贵的是他提出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创作主张,在当时确实是一种进步的见解,不失为中国现代文学白话新诗建设的理论先导。1899年,梁启超正式提出“诗界革命”口号,主张诗歌要有新意境、新语句,这种新意境、新语句虽然只是发挥维新派之所长,在诗歌中杂以许多新兴名词,如谭嗣同“纲常惨以喀私德,法令盛于巴力门”之句(《听金陵说法》),但在近代诗歌崇尚唐宋的复古风气中,能够“捋扯新名词以自表异”,这在以诗歌为文学之正宗形式的文化传统氛围中,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白话文”的提倡也是晚清维新派的一大贡献,黄遵宪根据自己对西方文明进步的考察,在《日本国志》一著中要求应使“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并且提出三点重要意见:一是中国文字之所以难学,是因为语言和文字不相合的缘故;二是文字和文体的日趋简易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自然规律;三是小说家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学的用途,将来只有在文字上更趋简易一途。当时极力主张采用白话文的还有裘廷梁,他自己编辑了一套《白话丛书》,在序言中,他用“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这样沉痛有力的分析把文字和语言分离的坏处说得十分具体与彻底。他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正式揭开了20世纪文言与白话之争的序幕。维新派们不仅在理论上倡导,而且组织白话学会,创办白话报刊。戊戌变法前后出版的白话报纸计有《无锡白话报》、《杭州白话报》、《京话报》等十余种。这些先驱者的主张与实践对五四新文学革命以白话代替文言之主张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与直接的。

总之,晚清维新派倡导的“新文体”、“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等,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变迁为根基,以具有明显近代色彩的文学观念为指导,在文学观念、创作方法、文学体式、文学语言诸多方面展开了一场改良革新的尝试。虽然由于中国社会所提供的条件尚不成熟,倡导者自身也有种种从旧文学中保留下来割弃不去的尾巴,尝试的努力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但它们的确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场有意义的预演。他们的成功与失误,都在期待和呼唤着一场新的文学革命运动,呼唤着文学解放的历史新高潮的到来。

19 世纪以来,由于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世界各个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被逐渐打破,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在现代社会生产的条件下,一个民族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再也不是也不可能是在纯粹民族的规模上进行的了,现代世界各民族建立起来的日益广泛的联系,使每个民族都有可能更为充分地借鉴人类文化已有的丰富成果,以促进本民族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发展。在中国,从 19 世纪后半叶开始,那些倡导改革的先进思想家几乎毫无例外地注重向西方学习。就文学领域而言,早在 20 世纪初期,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已经略有成绩。当时著名的翻译家林纾以其质朴古健或者哀感顽艳的笔触,录译欧美诸国小说 180 余种,计 1200 万余言,其中包括狄更斯、雨果、司各特、大仲马、哈葛德等大家之作。影响之巨,同辈中无人能望其项背。学者王国维引入康德、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与美学观,强调了文学超然于利害之外的独立价值,锋芒直指“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观念,同时,他还运用叔本华的“意志说”分析中国的文学现象,为中国的文学批评由古典方式向现代方式的转换架设了一座桥梁,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将们及中国现代文学最早的一代作家们鲜有不受其影响者。值得指出的是,曾经参与五四文学革命的第一代现代作家们与外国文学的联系,较之前辈更为密切。他们或者负笈欧美,或者留学东洋,都是在外国度过了青春时期和文化修养的定型期。在留学时期,他们都曾大量地直接阅读外国文学作品。鲁迅在 1907 年即向国人详细介绍了拜伦、雪莱、裴多菲、密茨凯维奇等西方 19 世纪浪漫主义诗人。胡适在美国修的是哲学史专业,但对文学也十分关注,虽然他在 1917 年倡导文学革命的主要思想基础得之于他的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但他提出的一些具体主张显然受到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启发。由于这些文学革命的主将们恰恰是在自己的文学修养成型期大量接受外国文学的,外国文学的思想内容与审美风格浸透到了他们的精神结构中,影响着他们的文学观念、审美情趣及艺术思维方式等内在的人格因素,同时也使他们在东西文化之间产生了一个整体的、对照的价值观,具备了从整体上否定中国封建文化传统并且从整体上

肯定西方文化传统的激进心态。所以说,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变革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从政治觉悟到伦理觉悟的主题转换,是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提供了时代依据;近代维新派倡导的文学改良是为五四文学革命准备好了思想资料;而外国文学的影响及文化价值观对照体系的位移则是为五四文学革命的萌生找到了理论武器,创造了具有彻底反封建性的新型文化精英。正是在这种种历史条件的综合作用下,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终于应时而发了。

第二节 改良八事与革命三义

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文学革命的中心观念“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表现现代人的思想。现代人的语言是白话文,现代人的思想就是民主、科学、个性解放、人格自由,也包括后来提倡的社会主义”^①。反对文言提倡白话是为了建构现代语言形式,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是为了确立现代思想观念,这二者的最终旨意则在于从意识与言说的全面革新来实现现代民族品格的重铸。所以,五四文学革命一开始就是循着现代语言形式的建构和现代思想观念的确立这两条相互依存的思路而展开的。由于文学革命主将们的文学修养、个人性格、学之专长各有不同,因而在围绕这两个中心话题参与新文学的讨论时,也呈现出各自的特色。

胡适于1917年1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发难文章。文章指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因这“八事”每一事都是针对封建旧文学的弊端而发,故又称“八不主义”。其具体内容如下:一是“须言之有物”,反对“近世文人沾于声调字句之间”的“文胜之害”,主张新文学的创作要特别注重情与思二者。二是不模仿古人,胡适在此运用进化论的观点,说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所以,“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也就是“唯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的文学。三是“须讲求文法”,遵循语言本身的规律与定则。这一条一方面是针对旧文学所谓“书读千遍,其意自见”的成规而发,另一方面也是为新文学的创建立下了一条规则。四是“不作无病之呻吟”,认为文学青年受古代文学浸染,对落日而思暮年,临秋风而思零落,写诗作文所取笔名也故意用“寒灰”、“无生”之类灰色词语,这是“亡国之哀音”,必须戒除。五是“务去滥调套语”,主张“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

^① 王瑶:《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序》,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

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六是“不用典”，胡适认为用典之因在于旧式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故借用不适切的故事陈言来代替，此类用典皆在摒弃之列。七是“不讲对仗”，指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先立乎尤其大者”，不应将有限的精力用在这种微细纤巧的文学末技上。八是不避俗字俗语，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字俗语，“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以上“八事”从文法、词汇、修辞、写作技巧及思想内容等多方面对文言文和各种旧形式进行了否定，并且用历史进化的眼光分析了中国白话的起源与发展，明确指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一年以后，胡适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进一步阐述他对于建设新文学的意见。这时的胡适通过对欧洲各国国语历史的研究，认识到在世界语言发展史上，没有一种国语是由政府教育部门或语言学专家闭门造成的，它是文学家通过创作国语的文学而造成的。要造国语，首先应创建“国语的文学”。所以，在这篇文章中，胡适将他的文学革命主张归纳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并把这“十字”视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唯一宗旨”和“根本主张”。这里所谓“国语”，指的就是标准白话。胡适提出这“十字”纲领，不仅将白话视为新文学之正宗，而且把新文学的建设与全民族的国语建设运动联系起来，从而也把他的语言形式的革命思想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因此，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中，胡适的功绩是巨大的。首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虽然用语温和、态度持重，但它不仅揭露了旧文学的种种弊端，而且正面提出了以白话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主张，号召以白话取代言文，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是起到了文学革命的发难作用。其次，胡适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因而，“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这种文学革命思路是对世界各民族文学变革历史经验的总结，也充分考虑到了白话取代言文正是当时新旧斗争的一个焦点。这种现实情势，对五四文学革命的顺利、扎实与稳步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为了声援与支持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陈独秀于1917年2月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文章首先以欧洲革命的成功史与中国革命三次失败的历史教训为借鉴，说明文学革命之必要性和紧迫性，把文学革命作为现代社会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故“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但是我国近代“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盘踞吾人精神